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
THE CIVILIZATION
ON THE BAMBOO AND SILK

长江文明丛书

丛书顾问 李学勤
丛书主编 陈剩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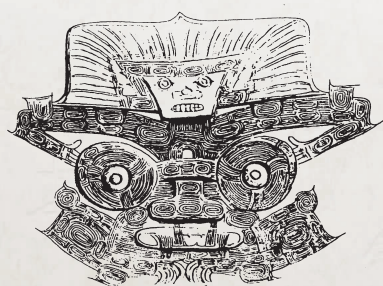
写在简帛上的文明

长江流域的简牍和帛书

◆ 廖名春 张 岩 张德良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长 江 文 明 丛 书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

写在简帛上的文明： 长江流域的简牘和帛书

廖名春 张 岩 张德良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The Civilization on the Bamboo and Silk——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and Silks Unearthed in Yangtze River Valle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在简帛上的文明：长江流域的简牍和帛书/廖名春,张岩,张德良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4

(长江文明丛书;文图本/陈剩勇主编)

ISBN 978-7-308-06504-7

I.写… II.①廖…②张…③张… III.①长江流域-简(考古)-研究②长江流域-帛书-研究 IV.K877.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2811 号

写在简帛上的文明——长江流域的简牍和帛书

廖名春 张 岩 张德良 著

丛书责编 黄宝忠

责任编辑 宋旭华

文字编辑 陈佩钰

封面设计 张 磊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编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0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504-7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 88925591

长江文明的历史意义

陈剩勇

20世纪下半期以来，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跨学科合作，田野考古与科学研究互动，探赜索隐与争鸣辩论并进，把我们对于国史的认识引领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到演进，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到发展，以往历史教科书上的许多知识、定论和成说，都在以惊人的频率被改写、修正和刷新。特别是推翻了从司马迁时代就已经根深蒂固了的“中原中心论”历史观，证伪了从传统“夷、夏”观衍生而来的有关中华文明的种种成说和定论，于是有了长江文明和地域史研究的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按照传统的“中原中心论”历史观，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地区是天下之中心、中华礼乐衣冠文明的发祥地。中原文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带不断地作单向度传播、辐射和扩散，而中原以外的“四夷”之地，包括整个长江流域，直到汉代时还是不开化的“蛮荒之地”。居住在长江流域的原住民，都是些“断发文身”而“不火食”的蛮夷，只是在汉魏以后不断接受中原文明的传播和教化，才逐渐开化和文明起来。

建立在“中原中心论”历史观基础上的种种历史知识和定论，其实是传统历史家们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对长江文明的无知和偏见。当代学者开始将历史研究聚焦的镜头，从黄河流域投向长江流域及其他流域，以多维的视角、多元的文化价值观，重新审视和认识早期中国的文明和历史，重新评估“四夷”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地域文化价值及其历史意义。

二

早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革命已经在长江、黄河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同步发轫。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大考古文化区系，即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文化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文化区，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区，从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区，以及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北方文化区。这些新石器文化各具特色，自成体系，具有了种种别具一格的地域特色和早期文明要素。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如下一个事实：在距今约5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代，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下游三角洲地区，以及东北的辽河流域，已经出现了一批“古国”。这表明，从夏、商到西周、东周，这些被传统史家推崇为大一统王朝正宗的早期王朝虽然都定鼎于中原，但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却绝非中原一地。换言之，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要素固然为中原先民所创造，但更多的要素却来源于非中原文明，其中尤以长江流域（主要是中下游地区）先民首创的最多，最为卓著。

中华文明有礼乐文明之称，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礼、礼制早在5000年前已经在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中出现，并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夏、商、周三代王朝作为立国重器的鼎、钺，以及三代统治者祭祀天地用的玉琮、玉璧和玉璜等基本礼器，大多为良渚文化先民首创或完善。从物质文明的层面看，中华文明的诸多基本要素，如瓷器、丝绸、铁器、稻作农耕等，许多最早也出现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长江流域栽培水稻成功，促使南方地区在大约距今1万年前后就开始了从采食经济向产食经济过渡。高温烧窑和瓷器制造技术的成熟，织机的发明和丝织业的发展，铁制工具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推广，不仅对长江流域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为秦汉以后中华文明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正如百川入海，九九归一，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中的种种文明要素，随第一王朝夏朝的崛起而汇集到中原地区，从而陶铸发展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体，为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丝绸之府”和“瓷器之国”的美称。

三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爱琴文明和玛雅文明等五大古代文明并驾齐驱，在于她的历史古老悠久，更在于她的内涵博大精深。在几大文明中，也惟有中华文明绵延不衰、巍然独立，延续发展数千年而至今。文明太阳为什么在中国永远不落？古老的农业文明为什么能够延续数千年而至今？对此，不同的历史学家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猜测和假说。我以为，撇开东方文明生存的自然环境等等因素，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兼容性特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历史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绝，中华文明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其原因就在于，早在起源阶段已经取精用宏，吸收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血脉精华。中华文明在东亚大陆如此辽阔的区域空间内实现文明的全面交融和积聚，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古代文明都无法达到的境界。

在夏、商、周三代确立了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统一、规范的礼乐文明之后，在秦汉大一统皇朝定都北方、政治中心长期固定在中原地区的情况下，正是这种江河兼济、南北汇聚的兼容性特质，决定了中华文明得以在与异域和异族文明的交流、冲突和碰撞中兼收并蓄，从容地“拿来”对手的观念、制度和器用为己所用，不断输入新鲜血液，使之长久地保持着青春活力，成功地经受住一次次大动荡、大混乱和大分裂的洗礼。即使发生了像“五胡乱华”那么激烈对抗型的异族入侵，最终也能从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实现融合。

历史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了唐宋以后长江流域经济崛起的历史意义。随着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江南经济日益发展繁荣，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了从中原向江南的转移。这种趋势至南宋成定局，所谓“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长江流域从此成为定都北方的大一统皇朝的主粮仓、大金库。从宋元到明清，长江流域的粮食和财富通过大运河源源不绝地输往中原。

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百越文化和吴越文化等等交相辉映，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宝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已经贡献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及孙武、范蠡、屈原等一大批思想家。两汉时期的长江流域，前有《淮南子》为代表、以黄老之学为

表征的新道家，适时地矫正了秦朝“以法为教”的法家暴政意识形态；后有大思想家王充揭橥“疾虚妄”之大纛，以实证的精神针砭东汉谶纬神学和庸俗经学之流弊。魏晋之际，以“儒道兼综”为特征的“三玄之学”即魏晋玄学的兴起，结束了两汉“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发生了又一次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大融合。巴山蜀水哺育的张天师及其“五斗米道”，最后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惟一的本土化宗教——道教。而佛教传入中国后，也经由长江文明而孕育了中国第一个本土化的佛教宗派。佛学大师智□，在天台山化缘建造佛寺，聚合僧众，潜心研习佛教，创立了佛教宗派天台宗。南宋时期的赵宋皇朝定都杭州，随着政治中心、经济重心南移成为定局，长江流域也开始确立了其与经济地位相称的文化中心地位。江西学、湖湘学、蜀学、闽学，还有“浙东之学”旗下的婺学、永嘉学、永康学，先后崛起于长江流域，将中国的学术推进到了更高的境界。长江流域的文学艺术别具特色，前有楚辞、汉赋的繁荣，后有东晋六朝山水诗的勃兴。科学家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最重要的科学著作之一，平民毕昇在杭州城的印刷作坊里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则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

明清以降，政治中心虽然随着明成祖迁都北京而远离长江，但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并没有重返中原，而历史性地长驻长江流域。在皇朝专制主义政治的超强控制下，在“文字狱”的不断蹂躏折磨下，中原越来越趋于保守僵化，而长江流域却凭借其经济重心的地位，以及政治边缘化的地域优势，崛起成为“文物之邦”、新思想的发源地。从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以“心学”相号召，聚众讲学，开创王学，风动中国，到王阳明的弟子们创立“浙中王门”学派；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到戴震、龚自珍，还有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等等，长江流域孕育出无数风流人物。他们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新文化的倡导和社会改造发生重大影响。

四

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来看，长江流域的南蛮、百越等原住民的基因和血液的输入，对于汉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化也有积极的作用。

在中原遭遇漠北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中原地区长时期为异族侵占的

几个历史时期，如西晋“五胡乱华”形成的南北朝时期、赵宋皇朝偏安杭州的南宋时期，一方面，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腹心之地，接纳了一批批从北方迁移过来的世家大族，使成千上万从中原兵燹中逃生的汉族流民拥有安居之地，汉唐文明和汉族人因此获得了发展再生的平台；另一方面，南下的汉族移民，与长江流域土生土长的南蛮，山越，巴人，蜀人，苗民，西南夷、僚、徭等原住民通过通婚不断地融合，改良了汉族的人种基因。

汉族自汉代以来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发展成为现今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民族，既要归功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融入，也要归功于长江流域无数土著的不断汉化。

五

中华文明汲取了黄河、长江的精华而诞生，又在两大母亲河的共同哺育下发展壮大、繁荣昌盛。历史地看，正是因为有了长江和长江文明，有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互动和融合，以儒家文化为主体、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相辅相成的大一统中华文明，才得以薪火相传。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教科书亟须改写重修，长江文明的历史价值需要重新认识，长江文明的历史地位应当重新评价。

我们注意到，至今为止，有关长江文明的一系列新观念、新见解和新知识，大多还存放在一些历史学家的计算机里，或一些深奥的史学专著中，没有在知识界传播普及，更不用说一般大众了。因此，有关长江文明新知识的普及，以及一般历史教科书的知识更新，就显得迫切了。有鉴于此，浙江大学出版社向广大读者郑重推出这套文图本的《长江文明》丛书。其中第一辑共5册，分别为：

1. 《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周膺、吴晶著；
2. 《三星耀天府：三星堆文化和巴蜀文明》，周新华著；
3. 《儒家大学堂：长江流域的古代书院》，金敏、周祖文著；
4. 《古韵悠扬水磨腔：昆曲艺术的流变》，王丽梅著，傅谨审订；
5. 《写在简帛上的文明：长江流域的简牍和帛书》，廖名春著。

参与本丛书撰稿的作者，大多是近年来在长江文明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中青年专家；参与丛书策划、编辑的则是一批希望为弘扬光大民族文化而有所作为的青年出版人。新学人、新知识、新见解，意新文美，是丛书

追求的特色。我们设想以全新的视界，优美的文字，图文并茂的装帧，向广大读者深入浅出地介绍长江流域各个时期的地域文明，发掘其中的丰富内涵和底蕴，全面展示长江文明。但愿读者能通过阅读本丛书了解长江、认识长江、热爱长江。在中华文明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这些长江学者和出版人——长江文明的传人，希望以我们的知识和工作，以自己绵薄之力，与国人，特别是我们的读者一道，共铸中华文明的新辉煌！

文字之所以成为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因为它克服了语言的局限,超越时空,使人类创造的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墨子云:“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何也?就是因为先人发明文字,而“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因此,在文字发明的同时,就必须考虑书写文字的载体了。载体的质料,由于世界各地自然环境的差异,在这个方面也有所不同。如古埃及曾用纸草,古印度用贝叶,而中国则用简牍。简牍就是竹简木牍的合称。简,《说文》云:“牒也。从竹,间声。”牍,《说文》:“书板也。从片,賣声。”片字,像“木”字一剖为二所得之半木形。从这里可以看出,简是用竹子做的,牍用木片。其实,在出土文物中,也有木简,也有竹牍。无论如何,简牍是廉价易得的材料,故能成为最重要的书写载体。《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训为“常”,《说文》则说,“典,五帝之书”,所以后世“经典”二字连用,意即重要的书籍。《尚书》这句话是说殷的先人拥有典籍。殷人使用竹简,这在甲骨文中也有反映。如甲骨文中的“册”字,就像用两道编绳把竹简编起来;甲骨文中也有“典”字,像双手持册形。就是从甲骨文的书写文例上,也能看出是竹简的书写文例影响了甲骨文,而不是反过来。如竹简为长条形,书写时自然就要从上到下,待到竹简编连成册时,整篇的书写就是直行,甲骨文也是如此。虽然甲骨文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成系统、较为成熟的文字,甲骨文是这种文字所能见到的最重要的载体,但是不要以为在殷商时只用龟甲、兽骨作为书写材料。且不说甲骨文的性质是王室贵族的占卜记录,就说甲骨材料的坚硬与难得,甲骨肯定承担不了发达的商代文明需求的重任。其他诸如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等也都不能堪此大任。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古代的书写工具——毛笔。世传秦朝名将蒙恬造笔,如《太平御览》引《博物志》则如是说。考古发现证明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自1954年在湖南长沙发现第

一枝战国毛笔始，随后1957年在河南信阳、1988年在湖北包山都发现过战国的毛笔。战国时期的毛笔也绝不是最早的。我们在相当于龙山文化期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上就看到了一个朱书的“文”字，这说明那时已经在使用毛笔了。有了毛笔这样便捷的书写工具的佐助，简牍大行其世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可以说，在古代简牍是纸发明以前最重要的书写材料。只是由于时间的久远，商周时期的简牍很难保存下来。目前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简牍，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简。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的文化政策以图巩固统一，这是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但为了思想统一，钳制众口，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恶政，使文化得到极大的摧残。丞相李斯给秦始皇上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这不仅仅是“罢黜百家”，更要把这些书籍都消灭。秦人所能拥有的，“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要学习法令者，就要“以吏为师”。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建议。从出土的秦代、西汉早期的文献来看，焚书令得到彻底执行。如在著名的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中共出土1000多支，内容为文书、法律和日书，还有学习作吏的《为吏之道》。在其他秦简中，如最近发掘的里耶秦简，多是文书；天水放马滩秦墓出《日书》；江陵王家台秦简中除了《效律》、《日书》外，还有《归藏》，这是属于卜筮类；沙市周家台秦简中除《日书》外，还有《历谱》、《病方及其他》，都是属于方技类。这些书籍都是在秦法律的允许范围之内。这种情况甚至到汉代初期都没有改变，直到汉惠帝时废除“挟书令”。在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1200余支简中，《二年律令》、《奏谏书》为法律，《脉书》、《引书》、《算术书》、《历谱》都是属于方技类，这些都不在废除之列。只有《盖庐》、部分《庄子》算是子书。要知道，这座墓的下葬年代在吕后至文帝初年，已在废除“挟书令”之后了。这些可都归于秦朝法令的严酷，“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从今天的考古发掘来看，秦时法律执行的彻底，也是不容置疑的。

不过，汉惠帝废除挟书令后，学术、文化确实开始慢慢恢复。而这时重要的典籍也得以重出。见于史册记载的文献出土的重大事件，有三次。一是“伏生尚书”。伏生本是故秦博士，秦焚书时将《尚书》藏于壁中。汉朝建立后，有亡佚，只能得到二十九篇，以此教于齐鲁之间，称今文《尚书》，后世讲《尚书》的都是从伏生开始的。二是“孔子壁中书”。汉武帝时，鲁恭王要扩建宫室，拆孔子宅，从壁中发现了用战国古文写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达数十

篇。孔子的后人孔安国整理,想献给朝廷,因故未成。三是“河内女子的简书”。据《论衡》,汉宣帝时,河内的女子发老屋,得到了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其他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广求民间藏书,如《周官》等就是古文旧书。随着这些出土文献的整理,推动了汉代学术的发达,也引起了经学中著名的今、古文之争。

此后,在西晋初年时,汲县有叫不准的盗墓贼盗掘战国时期的魏王墓,发现了大批竹书。经过荀勖、束皙等众多学者的整理,计有《纪年》13篇、《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2篇、《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师春》1篇、《巢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2篇、《生封》1篇、《大历》2篇、《穆天子传》5篇、《图诗》1篇、《杂书》19篇等。这些书号称“汲冢书”。汲冢出土的书籍完整传承至今的是《穆天子传》5卷及附于其后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其中的《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编年体史书,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书。虽然此书传到宋代就已经亡佚了,但学者将散见于它书的引文汇辑起来,称古本《竹书纪年》,对先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

简牍的再次涌现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探险活动而发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等在我国西北边疆从事探险活动,在楼兰古城遗址、尼雅遗址、敦煌长城汉代烽燧遗址等地掘得大量汉文、佉罗文、婆罗迷文简牍、残纸,这些就是罗振玉、王国维所艳称的西北汉晋简牍。王国维曾将这些新发现与甲骨文、敦煌千佛洞六朝及唐人写本、明清大库文书档案作为推动新学问的“最近四大发现”,认为这四者中的任何一种,其价值都可与孔壁中书相比拟。

这些西北汉晋简牍的获得,多缘于西方探险家的探险活动,虽然能知道出土地点,由于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因此失去了大量的考古信息,造成学术研究的重大损失。而且多被掠夺出境,分散各处,不利于学术研究。1949年后,新又获得居延汉简、敦煌悬泉汉简、额济纳汉简等众多简牍,数量巨大。由于是科学发掘,得到了较好的整理与保护。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发掘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在6号墓中发现600余支简牍,其中就有甲、乙、丙三个本子的《仪礼》若干篇,材料发表后,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若就全部西北汉晋简牍而论,除了上述东汉时期的《仪礼》三种抄本和之前曾发现的《仓颉篇》、《急就篇》少部分小学蒙书外,均是当时日常行政、军事文书。王国维认为这些发现的学术价值足堪比于孔壁中书,是就推动汉晋史、西北史地

等研究而言的,若就中国传统学术来说,这些文书是不能与孔壁中的《尚书》、《礼记》、《论语》等经书相提并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北等地,出土了一批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竹简4942支、木牍2块,主要内容有《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十三篇》等,木牍上则是《孙子兵法》和《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篇题,其中尤以《孙臆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并出,解决了《孙臆兵法》的千年疑案而名闻一时。1973年发掘的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了《论语》、《儒家者言》、《文子》、《哀公问五义》、《保傅传》等简书,有力地推动了一些学术问题的解决。

写到这儿,请允许做个简短的总结。

从地下出土的简牍,由于承载了大量的信息,而且是未被修改过,因此能促进学术研究的较大进展。西北汉晋简牍绝大多数是行政、军事文书,缺乏影响政治、社会生活的典籍;临沂银雀山汉墓、定县八角廊汉墓所出竹书虽然出土了一些典籍,但是毕竟是在相关文献已经被写定的西汉;孔壁中书、汲冢竹书都是战国时的文献,且多有与传世经典相对应的简书,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虽然得到当时大学者的整理,但传到今天的仍十不及一二,这是学术史上的重大遗憾。

幸而在今地下大发现的时代,这一遗憾也能得到稍稍的弥补。

1993年抢救发掘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得竹简804支,有字简730支。简书多为道家和儒家著作。道家中现有《老子》甲、乙、丙三组抄本,这三组虽然都不是足本,但内容基本不同,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老子》本子。道家著作中还有佚书《太一生水》。儒家著作中既有与传世本对应的《缁衣》,也有《性自命出》、《六德》、《成之闻之》、《穷达以时》、《唐虞之道》等佚书,为我们了解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中前期学术提供了很好的素材。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买的1200余支战国竹简,经研究,约略与郭店简同时,其中有《孔子诗论》、《周易》等重要古籍。1987年发掘的湖南慈利36号战国楚墓,得残简4371支,内容有《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等书。1957年发掘的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其中有属古书的残简119支,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墨子》佚书。

秦代的简牍前此未曾发现。1975年至1976年发掘湖北省云梦睡虎地12座战国末至秦代墓葬,其中第11号墓出土大量竹简。经整理得到1155支,其中有《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等书籍,使得我们

第一次看到秦代的法律,第一次看到秦人手写体文字。1993年发掘湖北江陵王家台115号墓出土秦代竹简,识别出过去被认为是伪书的“三易”之一的《归藏》。

1973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有大量帛书,约十万字,中有《老子》(甲、乙本)、《周易》和属于黄老学派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等重要古籍。1977年在安徽省阜阳市城郊的双古堆发掘的1号墓,出土一批简牍,简书中有《周易》、《诗经》、《仓颉篇》、《庄子》残片等重要典籍的残片。1983年发掘的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竹简1236支,其中有《二年律令》和《奏谳书》。该墓的年代在西汉吕后至文帝初年。这为我们研究汉初的法律及其与秦律的联系提供了资料。

1996年7月抢救发掘长沙走马楼吴简,约有10万片简牍,内容主要是长沙郡和临湘侯国的地方文书档案。这对史料相对较少的吴国史研究是个十分重要的发现。

上述所谈的仅仅是长江流域所发现简牍的荦荦大端者。其他发现,读者可参看书后所附的“长江流域出土简牍目录”。

这些数量众多的发现,既有位于长江上游的,如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也有位于下游的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但其中数量最多的当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所出战国简、秦汉简、吴简占长江流域所出简牍的大多数。

与黄河流域出土的汉晋简牍相比,长江流域出土的简牍有三个优点:一是时间跨度大,从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简、秦代的睡虎地简、汉代的张家山简,一直到魏晋时期;二是这些简中或有早至战国中期的《周易》、《孔子诗论》、《老子》、《缁衣》这样与传世典籍相对应的,也有众多佚失的儒家、道家、兵家、黄老、方技等著作,学术意义重大;三是其中绝大多数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能为后续研究提供较多的信息。

之所以能出土如此之多、如此重要的简牍,长江流域除了拥有较为有利的保存条件外,它自身文化的发达应是更重要的原因。其实,人们改变对长江流域文化落后的认识并不是从简牍帛书的大发现开始。

自从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根本任务之一。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特别是建国以来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突飞猛进,使得各地考古学文化面貌基本清楚,在许多地方形成了考古学文化谱系,而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特点逐渐得到承认。根据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